梁思成与中国古代建筑

——记“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楼庆西

198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证书，表彰梁思成教授和他所领导的集体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并授予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对梁思成一生所从事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研究的最高嘉奖。遗憾的是，此时梁思成离开人世已经有13年了。

梁思成，广东新会县人，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与学者梁启超的长子。梁启超因参加清末的维新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所以梁思成于1901年4月出生在东京。1912年，11岁的梁思成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堂，1924年赴美国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随即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廷史”的博士论文研究。1928年回国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1931年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应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之聘到北京担任该社的研究员与法式部主任，开始全身心地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与奠基者。

写中国自己的建筑史

早在美国留学时，梁思成就对建筑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古代建筑史，仔细参观了美国博物馆中自己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的珍贵文物，在哈佛念博士时又查阅了有关中国建筑方面的书刊，他发现这些资料竟多为外国学者所撰写，自己国家的学者反而对自己民族的珍贵建筑文化没有研究。 1925 年，他的父亲梁启超得到一本重新出版的 800 多年前宋朝廷颁布的一部建筑书《营造法式》，当即托人带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先宠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宝之。"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妻子，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与诗人，当时与梁思成一起在美国学习。尽管他们当时还看不懂书中的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但父亲激励的话促使他们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愿望。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回国的路程中特别游览了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士等国家，在游历欧洲时，他见到西方的古代建筑很久以来就受到妥善的保护，有众多的学者对他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长城、故宫、寺庙、园林是那么辉煌，但如今却是满目苍凉；龙门石窟、敦煌壁画被任意盗卖、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中国人学习自己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外国的学者。这些现象深深刺痛了梁思成的爱国之心，他感到这是民族的耻辱，他暗下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历史。

面对着历史留下的丰富遗产，梁思成怎样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呢？巍峨的长城，辉煌的宫殿，秀丽的园林……曾有多少文人墨客为这些遗迹吟诗作画。但是梁思成认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这些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因此，一开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说：我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他选择北京的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照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个去认识、测量、记录。那些常见的柱子、门、窗、地板还较易理解，但遇到一些从未接触过的怪名词，例如采步金、雀替、排山勾滴等，简直如读天书一般，一点弄不明白。面对这些疑难，梁思成老老实实地求教于一些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地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就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

1932 年 4 月，梁思成对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独乐寺进行了调研，对这座古寺的山门和观音阁作了详细测绘，查阅了史料，抄录了碑记，访问了老者，按总论、寺史、现状、山门、观音阁、今后保护等几部分进行整理，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梁思成对寺史作了考证，得出山门和观音阁建于公元 984 年的结论。对这两座古建筑从外观、平面、台基、柱子、斗栱、梁架、椽、瓦、墙、门窗、彩画等结构和装饰的各部分都作了详细论述和分析，绘制了外形和结构、细部的全套图纸，摄制了大量照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的成果，奠定了调查研究的基础，超过了当时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

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找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找古建的线索。梁思成在蓟县时遇见一位中学教员，言谈中得知这位教员的家乡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有一座类似独乐寺的大庙，梁思成闻之大喜，回北京后又立即带人去宝坻县调查，找到了已有 900 余年历史的广济寺三大士殿。民间谚语中说：“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梁思成就据此调查了民间传说的四件宝贝中的三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蓟

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 10 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式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经过他们测绘调查的主要建筑大多成了现在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严格，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 30 年代的华北地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1932 年他去河北宝坻县，如今只需三小时的汽车行程，那时却要经历八九小时。途中过箭杆河土桥，乘客都要下车涉水过河，让汽车空车过桥；一路在泥泞中颠簸，左右摇晃，倾斜几达三十度；下车还要换乘骡车到县城，然后身带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步行几十里才能到达山中寺庙。当时的不少县城，也十分破旧与贫困，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可以住宿，在贫穷的雁北地区，甚至买不到白面做的主食。有时住在庙中，白天随着和尚吃素斋，晚间与蚊虱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冻得只好把报纸压在薄被上以御寒冷。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梁思成仍坚持测绘工作要一丝不苟。对建筑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要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抄录无误。他和助手们经常爬上梁架，手按几十年的积尘，佝偻身体，俯仰细量，惟恐探索不周。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群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他们有时心中还惦记着时局的变幻，耽心着日寇会随时侵占华北，为了抢时间，往往一天坚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 1934 年，在调查应县古塔时，为了摄取塔顶照片，梁思成登上 60 多米高的塔顶，手抱铁链，两脚悬空地攀登塔刹，去丈量尺寸，然后又退到塔顶边缘去拍摄塔刹的全景，助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终于摄取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后来

回忆说：当时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几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他对自己对助手都要求严格，力求研究成果达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当时还只十几岁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几本当时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建筑书刊，指着上面的图对莫宗江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宗江教授回忆说：当时梁思成就培养我们要有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正是凭着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志气，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虽然工作艰苦，但却乐在其中。当他们借着老工匠的指点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处构造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们不顾污秽，爬梁攀架，在昏暗中发现一组宏大的斗拱时，会顿时忘却疲劳而欣喜若狂；当他们在古建筑上见到一个宋代《营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构件时，真像突然遇见久别的故人一样，长久兴奋不已。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他和妻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八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 1932年，他们夫妇二人在京郊八大处到香山的途中，发现在马路旁边，微倭的山坡上有三座小小的石佛龛，佛龛由几块青石板合成，貌不惊人，但都已经历了 700 多年的风霜，龛上的石雕呈现出南宋的遗风。梁思成赞赏这三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见《梁思成文集》(一)中《平郊建筑杂录》)巍峨的长城,嶙峋的古城楼,晨曦中的塔影,这些记录着我们民族不朽历史的胜迹都会给予人们以无尽的诗情画意，但是在建筑师眼里，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触，梁思成把这称之为“建筑意”。他们在调查中，就经常因为领悟到这种“建筑意”而兴奋。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过这些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对劳动创造的无比尊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过对古建筑的长期调查研究，梁思成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34 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的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作法、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使人们在多彩的古建筑遗迹面前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什么叫‘斗栱’？在梁檩与立柱之间为减少剪应力故，遂有一种过渡部分之施用，以许多斗形木块与肋形曲木，层层垫托，向外伸张，在梁下可以增加梁身在同一净跨度下的荷载力，在檐下可以使出檐加远，这便是中国建筑数千年来所特有的斗拱部分。”梁思成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斗拱，并分别对柱头、转角等部位斗拱的制度和复杂的组合作了详细的介绍。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讲授中国古建筑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也是如今古建筑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以后，梁思成在研究清代建筑构件‘斗栱’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汉、唐、宋、辽、金、元等各个时期建筑的斗栱部分，比较了他们的形制变化，从而总结出根据斗拱不同的制度和风格来鉴别古建筑年代的方法，这个方法至今仍为我国文物工作者所用。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梁思成本人和营造学社其他研究员刘敦桢教授、鲍鼎教授等共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此外，梁思成还负责编辑了《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佛塔和元代建筑专辑，分别集中了这一时期调查过的数十座佛塔和元代建筑的珍贵资料。该专辑1935年完成，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开始显出了雏形，只因抗日战争而未及出版。

从 1932 年到 1937 年初，营造学社曾前后到 120 多个县市，调查过 1000余座古建筑的房舍，但它们的建造年代还没有早于辽代

的，根据文献资料和敦煌石窟唐代壁画所描绘的五台山胜景，梁思成相信这个地区有可能存在着唐代建筑。 1937 年 6 月他与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出发去五台山寻找胜迹。他们经太原进入五台，骑着毛驴迂回在岖崎的山区，经过两天的搜寻，终于在第二天的黄昏走到豆村的佛光寺，发现在山腰上屹立着一座大殿。宏大的屋顶，深远的出檐，檐下疏朗而硕大的斗拱一下吸引住了梁思成，使他相信肯定这是一座辽代以前的建筑。他们立即开始作详细的调查，仔细地考查了大殿的结构和装修，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大殿梁下的字迹，确定了大殿建于唐大中 ·1,1 年(公元 857 年）。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发现了第一座我国封建盛期的建筑遗迹，他们高兴异常，这时夕阳西下，佛光寺一片红光，他们拿出带去的所有食品、罐头，美美地饱餐一顿，以示庆祝。正当他们沉湎在兴奋之中，北平卢沟桥畔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梁思成携带着佛光寺的宝贵资料，匆忙辗转返回北京，见到城里已是一片备战景象了。政府机关开始疏散，住宅胡同口挖了战壕，他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吁书上签了名，他主张营造学社向后方疏散。不久，北平沦陷，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注意到自己，竟想让他当汉奸为侵略者服务，他十分愤怒，第二天就带着家眷匆忙离开了北平，走上了逃难的行程。

从 1937 年 9 月开始，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带着家人，经天津、济南、徐州、武汉而到达长沙，穿行贵州，经历 40 多天的昼行夜宿，于 1938年 1 月才到达昆明。就在这次长达 4 个月的逃难行程中林徽因得了急性肺炎，使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后来导致肺结核病复发，身体更加虚弱。梁思成战前已患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到昆明后病情恶化，时常背痛难忍，昼夜不能入睡，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在床上平卧。不久，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先后来到昆明，学社在昆明恢复活动。 1940 年他们又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这时，营造学社原来经费的来源几乎断绝。

抗日的后方，物价飞涨，不用说研究工作开展困难，就连工作人员的薪金也常常难于保证，梁思成有时甚至还得变卖衣物以维持家人生活。抗战时期，美国曾有多所大学与博物馆邀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和工作，并能带家人同往，使林徽因得以治病，但他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梁思成与刘敦桢带领着他们的助手在抗日的后方又开始了古建筑的调研工作。他们从昆明到大理，直至剑川、丽江等高原地区,从重庆转成都,登峨嵋,东起宜宾,北到广元,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到过 50 余座城市,调查了建筑、崖墓、汉阙、石刻等古迹 800 余处。乡间的民房是他们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灯照明，只能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资料作参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无钱用铅印，完全靠用毛笔手抄文字，用钢笔画线条图，用石板一张张印刷，依靠连家属在内的全体人员用手工装订成册。尽管条件是这样艰苦，从写出报告的内容到绘制的图纸仍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平。

从 1932 年到 1941 年的十年期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共调查了 2700 多处古建筑，足迹遍及 190 县市，自宫殿、寺庙、石窟到园林、民居,从唐代古建筑到清代建筑,它们给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于 1942 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四出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代替照片的不足。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后方的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

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按中国建筑结构方法及其发展列举了中国古建筑的七大特征，并且从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观念、建筑的传统体制等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接着，他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图象中国建筑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这一时期的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46 年 10 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他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敬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赠授梁思成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见《中国科学与文化》第 4 卷）。

保护文物建筑的勇士

梁思成在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同时，始终注意着对这些建筑的保护工作。 1932 年，在他发表的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里就提出了对这座古构保护的意见。他说："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故目前最重要问题，乃在保护阁门现状，不使再加毁

坏，……”对于保护古代建筑是否要恢复原状的问题，当时世界上多有争论，而梁思成认为：“而愚见则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他在山东曲阜孔庙建筑修葺计划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在这里，梁思成提出了提高全社会文物建筑保护意识乃为治本的问题和保护修缮中尽可能保存古建筑现状而不要拆旧建新的重要原则。 1944 年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 1945 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战略反攻，他特地编写了一份敌占区文物建筑表，并附以地图作出不能轰炸的文物标记送交政府，并同时送了一份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此时，抗日战争进入后期，美国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梁思成特别向美国方面建议在轰炸日本时不要毁坏日本古都奈良招提寺等一些著名的古代建筑，因为他认为这些古迹不仅属于日本，也应该是全人类的珍宝。

1948 年 12 月，位于北平郊区的清华大学先得到解放，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平，一面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一面准备攻城。有一天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在北平的地图上标明重要的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以免在攻城时遭到破坏。这使梁思成大为震惊与兴奋，因为他正在为此而担忧，他愉快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还与营建系的老师一起编列了一本《全国文物建筑简目》以供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并改名为北京。梁思成以巨大的积极性投入到新北京和新中国的建设。为了迎接新政协的召开，

他领导建筑系的教师完成了怀仁堂的改建设计；当新中国的国旗方案通过后，他担负了将方案绘制成正式图纸公布于全国的任务；1950年他又领导建筑系老师设计了共和国的国徽，他与林徽因亲自绘图，应用他们全部的智慧，设计出了既表现出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又具有我们民族气质的国徽；1952年梁思成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他提出了纪念碑设计方案，这就是现在耸立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许多重要建设,都倾注了梁思成的心血,他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

在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大规模的建设开始了，作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设工作之中。他根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性质，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预见到古都北京与新首都之间的矛盾，于1950年初,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尽可能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梁思成还专门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建议把北京城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方面它们代表着古北京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体形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另一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为今用，为新社会服务。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城内的牌楼被拆除了,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号,在一次有关拆除北海团城的会上，梁思成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一，它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总理，总理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

50 年代初，政府各部门都想在北京长安街新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市中心主要干道的质量，保护北京城的民族传统风格，特写信给周总理，要求这条干道的建设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要求各部大楼设计应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协调，而且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有权修改这些设计。中南海要兴建楼房，梁思成设计出方案，特别采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比例和门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筑的创作道路。梁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这一座世界上仅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城，即使在整体上难以保住，也力争在局部保住古城的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建筑，以求古都北京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

随着全国各地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梁思成又及时提出对古建筑的整修必须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他形象地以自己的假牙为例来说明这个原则，镶牙时，因年纪大，医生给他做了一套略呈黄白色而不是雪白的、排列较松散而不是很齐整的假牙，所以看不出是新做的假牙，这就叫整旧如旧。他在审查西安唐朝小雁塔的整修方案时说,我们对它的做法是'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小雁塔就是这样整修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梁思成也看到了这个原则在木建筑整修中的矛盾，但他坚持在整修砖石建筑时必须如此。

从 19 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到 20 世纪中叶，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和总结，在必须从整体环境上保护文物建筑，整修文物建筑必须保持原状，不得任意改动或添加等重要原则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形成了若干例如《威尼斯宪章》这样的公认的章程。而这些重要的原则都是梁思成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50 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从这里不难看到，对于文物建筑保护，梁思成不仅在实践上是一位勇士，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学者。

毕生的事业

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思成为了把新中国建设好，为了将首都北京建设成为既是世界性的，又富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新城市，他积极宣传民族的建筑传统，宣传文物建筑的保护，主张新建筑要创造民族风格。在大规模的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在新建筑中过多采用古老形式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1955 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在建筑设计中“复古主义思想”的运动，批判的目标自然集中在梁思成身上，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但是政治性的批判不但不能替代而且只能遏制学术上的争鸣，错误的批判也解决不了梁思成的认识，他继续为新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为建筑历史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的事业而苦苦地思考着，探索着。

1962 年，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教育和文艺方面的会议，总结和纠正了对知识分子过“左”的政策。梁思成与他的助手重新开始了对宋朝《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并于 1965 年完成了上卷部分；他作为全国建筑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担任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委会领导工作，主持了书稿的审定；他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他将自己几十年研究中国建筑的心得深入浅出地整理成文，连续发表于报刊；他准备按照

自己的新认识和新的材料重新撰写原来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他还想写一本建筑理论的专著。这时，梁思成已经 60 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但是 1966 年 6 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梁思成的雄心壮志彻底埋葬。他被带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背上数不清的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于 1972 年 1 月含冤离开了人世。

1978 年梁思成的冤案得到平反。 1984 年,他生前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荣获建设部全国优秀设计一等奖。同年在美国出版了他 40 年代用英文撰写的《图象中国建筑史》，在学术界得到很高的评价，多位美术博物馆馆长、中国文化及东方美术教授都赞赏梁思成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是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 1985 年在国内出版了《宋营造法式注释》上卷。1986 年在他诞辰 85 周年时出版了《梁思成文集》共四集，收录了他生前的主要著作。1987 年，《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1 年为纪念梁思成诞辰 100 周年,将出版《梁思成全集》。

国 徽 诞 生 记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秦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是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的，当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全文如下：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这个具有强烈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艺术风格，极好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特征，庄严富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达到了政治含义和艺术造型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设计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它的产生经历了曲折的艺术创造和争鸣过程。

1949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公开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启事，其中提出对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8 月，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与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诗人艾青三位专家被聘为政协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8 月 20 日征集截止日期到达，共征得“国旗一千五百件，国徽几十件，国歌二百件左右”(马叙伦语)。

对于应征的国徽方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委员都表示不满意，委员会向政协报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9 月 14 日在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在此期间，美术家张仃和钟灵被委托继续进行国徽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及其说明书现存于政协档案馆。封面字样是“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这份文件是张仃和钟灵设计的 5 个国徽图案及其说明。这 5 个图案与张仃此前设计的政协会徽相似，且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相似。

9 月 25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梁思成应邀参加。毛泽东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关于国徽，大家都对初选的图案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1949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国歌、纪年 4 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等应邀在 1949 年 10 月 23 日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以及《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这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璇的结衬托”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合”并“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带领中央美院的国徽设计小组又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外圈与原先的 5 个方案相似，中间是一个彩色的斜透视的天安门图形。

1950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内容之一是审定国徽图案。

大会之前，1950 年 6 月 10 日，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了送审的 7 个国徽图案。在这 7 个国徽图案中，有 5 个是原来选出的由张仃、钟灵设计的；新增的 2 个，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由林徽因等设计的有 5 颗金星的方案，一个是张仃、周令钊等设计的有彩色斜透视天安门图形的方案。常委会议决定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并请专家们再作设计。

在 6 月 11 日下午四点召开的国徽小组会议上，首先由马叙伦传达了政协常委会的审议情况，然后讨论，大家就国徽采用天安门图案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6 月 11 日下午国徽小组会议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

6 月 12 日上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 8 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一同开会，组成国徽设计小组，讨论开展设计工作。梁先生还传达了周总理的要求，即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先生还在会上详细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与各方面对他们图案形式的意见。

对于设计过程，朱畅中先生生前曾回忆道：

“林徽因先生首先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去画天安门的透视图，她要我去系里资料室找出以前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天安门的实测图作参考。当我看到实测的天安门建筑立面图时，感到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本身就显示出一种庄严雄伟的气势，而且在视觉上有一种深远感。如果天安门图案采用立面图，不仅放大缩小作图容易，形象正确可靠，且略加阴影，就有浮雕效果。于是，我赶紧向梁、林两先生报告，建议改用天安门立面图。这建议得到梁、林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